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文化社会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社会与文化

——稀缺和团结的原则

[英] 布莱恩·S.特纳 克里斯·瑞杰克 著 吴凯 译

Society & Culture

Principle of Scarcity and Solidari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文化社会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社会与文化

——稀缺和团结的原则

[英] 布莱恩·S.特纳 克里斯·瑞杰克 著 吴 凯 译

Society & Culture

Principle of Scarcity and Solidari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登记号图字:01-2006-09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与文化:稀缺和团结的原则/(英)布莱恩·S. 特纳,(英)克里斯·瑞杰克著;吴凯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社会学系列)

ISBN 978-7-301-14795-5

I. 社… II. ①特…②瑞…③吴… III. 文化社会学-研究
IV. 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8261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Bryan S. Turner & Chris Rojek, 2001

书 名: 社会与文化——稀缺和团结的原则

著作责任者: [英]布莱恩·S. 特纳 克里斯·瑞杰克 著 吴凯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795-5/C · 051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9.5 印张 228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

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致 谢

完成早期的研究《身体和社会》之后,在过去 15 年间一直都有做这项研究的想法。近来,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做的一系列演讲中,团结和稀缺之间动态关系的基本框架日渐清晰。我们需要感谢约克大学的 John O'Neil 和 Egin Isin 教授在学术上的帮助。

对装饰性社会学的批判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产生,这个观点在《社会学回顾》(2000)中得到发表。第一章对社会学学科的研究最初作为在利物浦大学的一场演讲而公开,我们感谢 Gerard Delanty 对我们原始构想的批评意见。第二章有机类比部分最初在 Aberdeen 大学庆祝其 500 年校庆的演讲中提出。Mike Hepworth 帮助组织了那次研讨会并对观点的提出提供建议。有关权利的那章源于《利奥塔的政治》中对黑格尔、利奥塔和罗蒂的比较研究。第八章对亲密的探讨来自于 90 年代中期和澳大利亚 Deakin 大学的 Anne Riggs 的合作研究之中。有关老龄化和亲密的一些观点以前曾经被发表过。有关世界性美德的观点在 1998 年由 Engin Isin 在约克大学组织的一次关于城市和公民权利的研讨会中提出。有关“失序”、“选择”和“解决方案”的那几章得益于诺丁汉肯德大学的 TCS 研讨课项目。我们需要感谢 Roger Bromley, Stephen Chan, Mike Featherstone, Sandra Harris, Joost Van Loon 和 John Tomlinson 的帮助。Roger Bromley 对“新从属”政治的研究以及 John Tomlin-

son 对“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帮助尤其巨大。我们也要感谢葡萄牙 Charles 大学 2000 年 4 月份的研讨课项目,它帮助我们澄清了有关“解决方案”的观点的很多方面。我们的结论依赖对现代性中宗教和公民权利作用的一些看法。这些观点将会在《英国社会学期刊》中的“公民权利的腐蚀”与《欧洲社会理论期刊》中的“世界性美德: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中出现。第五章在《奥地利社会学杂志》2000 年第六期 239—256 页中以“工具的稀缺与价值的团结”为题发表。第八章收编入 A. K. Carlstrom, L. Gerholm 和 I. Ramberg 于 2000 年合编的《用身体来表现文化》的 15—45 页。

布莱恩·S. 特纳,剑桥大学
克里斯·瑞杰克,诺丁汉肯德

前 言

我们的研究试图围绕传统的社会行动主题来重建当代社会学，所谓的行动是从身体表现（赋予身体意义）的角度来理解的。我们的目标是，从一个严肃看待人类身体并且把环境政治与人类表现的软弱性联系起来的理论角度，来恢复社会学想象力。依据社会行动者的软弱性来描述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关注“人类状况”的社会学观点。为了把我们所认同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置于中心位置，对社会学的很多趋势采用一种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尽管我们认为社会学必须包括对社会生活的文化方向的研究，但是通过所谓的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已经被分解成一系列相关的领域——文化研究、女性研究、城市研究以及媒体研究。我们的目的在于显示多学科的教育优势很好地满足了商业驱动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需求，但是对学术本身却没有更多的贡献。我们对当前的“装饰性社会学”持有批判的立场，所谓的“装饰性社会学”就是一种沉溺于商业和大众文化的眼前利益中的社会学，它没有历史深度，不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对政治不太感兴趣。

我们的论点是，在人类身体表现立场上进行的社会分析为社会学能够重新赢得它对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原始关注提供了基础。我们需要一种社会学观点，它能够推动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历史过程的理解——战争、工业化、人口再生产、民族国家、技术和世俗化。

社会学能够最好地寻求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并且能够为变迁的负面后果提供解决方案。装饰性社会学把社会学理论从道德和政治上剥离开来,因此我们就想提供一个有关现代社会的一般性社会学。对经典社会学的尊崇,加上一种必须对新思想持有批判性反应和开放精神来解决现代议题的学术态度,共同促使这个想法的形成。本研究对经典社会学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概览,同时对当代发展(例如后现代主义、反身社会学、风险社会和全球化理论)加以介入。我们研究了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以及齐美尔,同时也对布尔迪厄、埃利亚斯、吉登斯和 Castells 的贡献加以评价。虽然这个名单显然是一个男人的名单,但是我们对身体表现的兴趣也受到了对身体表现、关怀和声音的伦理学的女权主义分析的启发。我们从 Mary Douglas, Juliet Mitchel, Rosi Braidotti, Carol Gilligan, Luce Irigaray 身上,也从不同的有关身体的女权主义哲学中受到启发。然而我们对身体表现的研究和许多女权主义解构认识论是有很大不同的。女权主义理论着力于通过检验身体的代表性政治意义来使之问题化,而我们则关注身体表现的现象学,它源自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和卢卡奇,就是说理解社会制度中(家庭、宗教、法律、劳动和战争)人类身体意义的异化,以及自由和公正的可能性。

我们的叙述从传统的社会科学开始。首先涉及韦伯的核心社会学观点,即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有关社会行动和互动的科学。行动和互动是社会学学科的基本问题,这是人类在满足需求、创立社会关系和制度、建立文化和解释的意义系统以及创建公共生活方式的无穷无尽的行动。我们把这些社会互动、交换和互惠称作“社会生活”。简单地说,社会学是一种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塑造它们的条件的科学。

19 世纪的社会学源于对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假设

的持续批判。我们的论点是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结束了社会学的传统阶段,并且开创了行动和结构、情感和行动、价值和意义的当代辩论。帕森斯的社会学是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因为它声称理性的行动者在追求他们的目标时,在一种稀缺环境中,当其他条件一样时,将会采用诡计和暴力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一种理性行动理论不能产生一个令人信服的社会理论,因为它不能解释社会秩序。当经济理性主义是行动的主要指导原则时,合作和团结哪里还能够存在?传统的经济学通过发明源于它们的基本理性主义假设的解释人为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历史或者情感的看不见的手。帕森斯通过声称如果人类共享价值观和规范,就能够在不摧毁社会的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来解决秩序问题。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解决方案存在于文化和制度之中,而不是在经济人的心理之中。社会行动者被共同的价值系统所社会化,从人类身体表现和行动的后笛卡儿观点来看,我们对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理解社会行动结构的企图。

帕森斯发展了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模型,其中经济学是一门有关稀缺的科学。本质上它是一门在稀缺环境中满足需求的理性努力的研究。相反社会学分析,通过共同的仪式、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一致接受的规范,社会团结的条件。对社会学来说,宗教(尤其是宗教仪式和庆典)一直是社会存在的黏合剂。心理学要研究支撑社会贡献和行动冲动的动机和动力。最后,政治学是研究目标分配中强迫性因素的学科。在帕森斯成熟的作品中,社会是二种要求之间的复杂动力:稀缺资源的分配(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社会整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存在于一个学术上的劳动分工之中,它们考虑社会行动的不同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帕森斯对社会系统的兴趣其实就是对行动系统的兴趣。

我们的研究认为团结和稀缺之间的动态矛盾是社会组织的推

动力。人类面临着(资源)稀缺问题,但是稀缺的社会根源更加复杂。批判理论家,例如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如何创造人为的需求以及通过广告和其他促销手段来刺激需求作过强有力的分析。虽然经济学传统上假设稀缺是自然短缺的后果,社会学传统则认为稀缺是强有力的社会群体试图建立垄断的后果。我们认为社会分层(首先是社会阶级)是稀缺的本质要素。从这点来看,我们生活在社会竞争状态中,这种状态首先由霍布斯所阐述,按他的意见,理性的男人们在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契约,以避免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这里我们故意使用“男人”这个词,是因为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假设交换和权力的公共领域是由男人们占据的。在霍布斯的心理分析中,男人们把女人当做稀缺资源并为之而相互争斗,以便生育和保证他们的血缘的延续。

一般说来,社会学家们一直在批判社会契约理论。受到迪尔凯姆的影响,帕森斯声称,缺少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个前提条件,社会契约将无法维持,因此创立国家并且捍卫文明社会的社会契约事实上必须先期假设社会的存在。社会契约理论因此是循环论证的。通过展示效用经济理论和霍布斯的国家理论的错误,帕森斯为当代社会学奠定了基础。他的社会学一直以来都受到批评,很大原因在于米尔斯推广的一个观点,即他的社会学是抽象和保守的。与之相对,我们认为帕森斯社会学的弱点在于他的行动理论。他的社会行动者对于社会情境都能够产生情感反应。譬如,帕森斯区分了对社会情境的认知导向以及决断导向,前者依据行动者对兴趣的定义,后者涉及行动者的满足。然而,奇怪的是,帕森斯的社会行动者仍然没有被赋予身体上的意义。事实上,至少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帕森斯认为人类身体是社会行动条件的一部分。我们对社会学传统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对社会行动者赋予身体意义,而且正是这个批评让我们可以理解现代社会生活的主

要动力。我们也大力借鉴了海德格尔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对社会存在和身体表现的更为生动和震撼的描述。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用很多笔墨来试图定义身体表现。我们更喜欢用“身体表现”而不是“身体”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想要说社会行动者的肉体存在是一个在生命周期中持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现象。其次我们认识到,赋予身体意义发生在社会世界而不是“自然”状态中。我们从许多经典的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引申出这个身体表现观点——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我们并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事实上它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劳动和异化的分析密切相关。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改造他们的环境以便满足他们的集体需要。他们是感性的和现实的行动者,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持续不断地改造环境和自我。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马克思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声称,历史只是对人类本质的连续和永恒的改造。

通过表明人类被赋予身体意义,我们和马克思一样拒绝唯物主义的还原论形式,这种形式中人类的生物特征决定了他们的历史。我们相当反对达尔文主义和进化心理学的一些当代版本的观点。社会关系要求个体在不同的行动中做出选择,由此对他们的社会存在状态具有反身性,这个假设是所有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特征。在韦伯的社会学中,目标和自反性把行动和简单的行为区分开来。社会行动者具有主动行动能力,为了执行这个能力他们需要身份和记忆。对过去行动的意识是记忆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有目的和连续的行动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自反性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体化的社会行动者,以便和其他的作为个体化(被赋予个性的)的社会人有意义地联系起来。成功地赋予身体意义也和我们所称的赋予自我的过程共同进行,这个过程就是人类变成具

有自我反身性、有目的和被赋予个性的社会主体的过程。社会化为自我是连续的和偶然的。记忆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受损,并且记忆必须不断地被重构,以便和一个人往日的经历一致。我们不承认一个固定和连贯的自我。赋予自我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和后现代的易变的自我观念相反,我们认为生活过程中的某些连贯性是有效和成功的社会行动的一个条件。可逆自我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并不合拍。

我们对身体表现的看法受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62)的影响。从他那里,我们发展出对日常世界中的社会行动者赋予身体意义的意识。海德格尔使用“Dasein”(意思是存在)这个术语来描述存在。从这个术语中,我们发展出身体表现必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进行这种看法。社会学家们在分析社会行动时往往忽视了空间的特定性。或许只有戈夫曼在其遭遇、舞台和后台活动的分析中对社会行动的环境有清晰的认识。譬如,对他来说,对后台的控制在其表现自我的讨论中是非常重要的(Goffman, 1959)。我们把社会关系的这个方面称作“行动的场域化”,来显示置于物理和社会环境中的活动。场域化对当代有关网络作为一种社会接触手段的社会后果的乌托邦式描写是一个重要的修正。身体在虚拟现实总是存在,赋予身体意义限制了虚拟社区的范围。在这个技术上让人惊叹的时代,建造一个家和一个花园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活动。

我们围绕身体表现重建社会学理论企图背后的核心观点是脆弱性。人类非常脆弱,因为他们面临疾病和年龄增长的过程。虚弱对人类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并且无视地位和财富上的社会差异,把人类团结起来。在现代社会理论中,虽然对情绪的文化相对主义做过非常多的研究,却忽视了由于虚弱的联结作用而可能存在的道德团结。《威尼斯商人》对它有完美的表达——如果你刺我

们,我们会不流血吗?如果你搔我们的痒,我们会不笑吗?虽然我们受到基于虚弱的共性的假设形成的人权观点的影响,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倾向于使用“脆弱性”这个术语,它表明我们对世界的开放以及我们用创造性和改革性的方法来应对这种开放的能力。对世界开放是 Peter Berger 和 Thomas Luckmann 为了表明人类必须共同工作以便建立一个文明世界来处理他们的脆弱性而发展出的一个思想。因为人类并不是由其直觉以某种机械方式来决定,所以他们与其生物性和眼前的环境处在一种易于变动的关系之中。然而,这种对世界开放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有压力,因此人类通过他们的集体活动来构建稳定的结构。社会制度的创立是这种世界构建活动的中心(Berger, 1980:ix)。

快要完成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们有幸读到麦金太尔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1999)。在这部著作中,他批判西方哲学忽视了有关人类的两个核心事实——他们的脆弱性和痛苦。他认为脆弱性解释了我们依靠他人来获得保护和维持生计。脆弱性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动物性的看法。虽然麦金太尔对脆弱性的看法和社会学中的研究取向一致,我们也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我们自己的研究,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包括马克思, Karl Lowith, 阿诺德·盖伦, Peter Berger 和 Thomas Luckmann, 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社会学分析的遗产的一部分。在麦金太尔(1999:6)同意梅洛-庞蒂的思想,说“我是自己的身体”时,我们的取向是把“身体表现”看做一个过程而不是把“身体”当做一个现象来探索。我们有关身体表达的脆弱性的观点和制度的不稳定本质以及社会世界的交互关联的本质相互联系。我们期望,在身体表现,制度和社会网络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普遍的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它反过来又为维护人权奠定基础。我们在一个全球体系中来讨论脆弱性和权利,在这里,文化的混杂性和碎片化让我们探讨世界性美德。

虽然麦金太尔也使用“脆弱性”来分析美德,他的倾向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

“脆弱性”概念来自拉丁语 *vulnus* 或者说“受伤”。我们看来,“脆弱性”明显地具有一个身体上的起源。在 17 世纪,脆弱性同时具有一个被动的和一个主动的意义:受伤和伤害。“*Vulnerate*”的含义就是伤害,但是它的现代使用方法只是人类面对伤害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脆弱性在其现代形式中变得更加抽象:它指人类面对心理或者道德伤害的能力。我们面临伤害是 Peter Berger 所称的“面对世界”的一部分,即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由生物性决定的或者特定物种的环境中。脆弱就是指一个情感和情绪的结构,它让我们在社会秩序中寻找一条道路。我们的脆弱性也是我们从自己对经验的开放性中获得情感满足的能力的一部分。因此在我们看来,是马克思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力的研究伤害的起点,因为他指向了社会行动结构中情感、实践和活跃的构成成分。我们脱离了麦金太尔的立场(它特别强调残疾和折磨),以便辩解说脆弱性并不只是被动的。

虽然力图避免一个完全悲观的社会科学(Lepenies, 1992),我们意识到人类费尽心力共同形成的社会世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我们创建的社会从来不是完美的或者说可以信赖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而不间断地社会变迁的世界中,结果是我们的世界从来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愿望。这个社会是暂时和不稳定的,因此也是不可预测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安排之中,在这里管理战略永远要求合作世界的融合、重构和重组。在快速现代化的条件下,社会安排的危险特点特别明显。制度建设没有完美的蓝图,并且我们都面临行动之反复无常的结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预知结果的世界中。用 Robert Burns 的话来说,老鼠和人的最佳计划都同样错误。

生活的不确定性是我们身体表现的脆弱性以及社会制度的不稳定性的结果,然而无论怎样生活还要持续。人类作为个体和社会群体拥有令人惊奇的恢复、生存和重建的能力。任何对围绕实现目标的手段的稀缺(用经济学理论来说)的分工和冲突的描述都必须注意协作、互惠和分享,它们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在对争夺资源的社会冲突之外,也存在一个值得庆贺的社会关系,我们在庆典、仪式和节日当中能发现这些关系。在我们的世俗社会中,我们已经丢失了所谓的迷人生活的基本形式,它是萨满教和早期宗教的特征。入迷,或者说神游身外的经历,或许可以在现代体育中被看到,它提醒我们社会的宗教根源。我们把这种社会生活中社会互惠和人际联系的倾向称为“相互交织”。

我们对社会关系有一种动态的看法,这里身体表现、赋予自我和位置安排指社会行动的必要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行动的“前提结构”。社会行动者在这个前提结构条件下具有脆弱性和虚弱的特点,并且社会行动在不稳定的社会制度中发生。社会生活的这种图景或许表现出一个悲观的社会模型,某种程度上它和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的《人口原理》(1976)中所阐述的人口理论的二难困境相关联。在马尔萨斯的世界中,生活是不稳定的,因为性冲动带来人口再生产,结果人口过度增长,它不是道德所能控制的,由此只能通过饥荒、疾病和战争来降低人口密度。因为人口超过食物的供应的话,人类就只能生活在苦难之中了。

在我们的研究中,对社会条件的这种负面看法是社会行动者必须的和总是存在的社会交织关系以及他们的抵抗、革新和变化的情感能力的一个部分。如我们所言,对社会行动者的这个看法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一致,即人类共同劳动产生社会生活。马克思对实践和人类本体论的认识源于他对费尔巴哈于1841年完成的《基督教的本质》的研读,书中费尔巴哈通过赞美人性的感官存

在来攻击基督教神学的抽象唯心主义 (Feuerbach, 1957)。正是费尔巴哈通过了解 Moleschott 的医学唯心主义,运用“吃 (essen)”和“本质 (essenz)”的双关语而宣称,“人就是他吃的东西”。虽然这些神学辩论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历史事件,费尔巴哈对我们感官的重要性的认识却不能被忽视 (Wartofsky, 1977)。作为感性的和现实的行动主体,我们随时欢迎共同生活的迷人的可能性。社会行动的结构是围绕着稀缺和团结的动力而组织起来的。

在依据社会行动来开始我们的社会学描述时,我们同意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原则》中把社会学定义为制度的科学 (Durkheim, 1958)。社会学家们对社会行动的方式和类型以及它们发生的条件都很感兴趣。迪尔凯姆宣称,社会学的三个主要分支是宗教研究、法律和经济制度 (Traugott, 1978)。人们可以看到迪尔凯姆是如何选择制度来阐述他的社会现实的观点的,即制度结构独立于个体之外,并且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规范性制约作用。我们对社会的研究也围绕着对我们所称的“规范性强迫制度”的兴趣而组织起来,并且我们试图参考宗教、法律和医学来阐述这些安排。这些制度在微观水平上规范性地组织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和福柯的政府管理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规范性法规和产生社会生活的微观政体。这些制度规范是社会行动条件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在当代社会中,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已经带来了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19 世纪的社会理论环境中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已经受到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挑战。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已经被经济的全球化所消灭,但是这些变化的确给传统的社会学带来很大困难。然而,我们的观点是,传统的社会行动框架的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范式,把日常生活与全球社会联系起来 (尤其是通过身体表现观念)。技术和工业